

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朱诗慧, 苏章杰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采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同一框架下研究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方言距离不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而城市包容性促进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同时能够缓解方言距离的负面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方言距离阻碍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而城市包容性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的同时弱化了方言距离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并非方言距离的作用机制,跨方言流动反而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这意味着方言距离阻碍劳动要素实现边际收益最大化的流动和配置。

[关键词]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社会融入;空间流动;文化差异;社会交往;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3)01-0101-11

一、引言

我国人口大规模的空间流动起源于户籍制度约束松动下人们对更高收入水平的追求。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优化了劳动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我国近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同时,流动人口自身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特别的,近年来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呈现出明显的上涨趋势^①,甚至有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户籍所在地“反向歧视”,即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收入高于本地劳动力^[1]。但现实情况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融入情况却不容乐观。很多流动人口尽管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他们并没有认同本地人这一身份,心理上存在隔阂^[2]。有相当一部分的流动人口处于城市边缘,面临难以定居的问题^[3]。实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在流动人口日益成为城市新增人口主力的现实背景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引导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安定下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是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流动人口进入一个新的城市,会面临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需要获得他人认同与自我认同来建立归属感^[3]。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值得我们特别关注。随着政策性和制度性壁垒的不断弱化,以文化为表征的非正式制度对市场整合以及经济效率的影响将会愈加凸显^[4]。文化的影响比制度更加深远,原因在于文化是在群体内世代传承的习俗和信念^[5]。那么,如何度量文化呢?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反映思维、信念和态度,影响认知和记忆^[6]。语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看待世界的方式^[7]。因此,语言是文化的一个合适的度量指标。对我国而言,语言的差异完全表现在方言上,方言是地区文化最显性的特征,是地域文化的有效载体,在经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8-10]。与

[收稿日期]2022-0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99);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21CJY007);辽宁省教育厅基本科研项目(LTKMR20221575)

[作者简介]朱诗慧(1990—),女,辽宁开原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微观计量分析;苏章杰(1989—),男,山东淄博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与劳动经济,通讯作者,邮箱:su_zhangjie@163.com。

①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17—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近5年农民工年均工资增长率为6.3%。

流动人口相关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表明,对本地方言的掌握能力越好,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越强,社会融入程度也越强^[3,11]。但这一研究策略难以避免流动人口对本地方言水平的“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刘金凤和魏后凯依据流动人口所处城市和家乡城市的信息,计算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方言距离,发现方言距离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和定居意愿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12]。但是,这种方言距离本质上是一个概率加权公式,其经济学含义是“任意一个A市的人与任意一个B市的人之间方言距离的期望”^[13]。本文认为,直接从流动人口家乡所在县(区)和流入县(区)测度方言距离,更为准确可靠。我国流动人口空间迁移的一个典型特征事实是,迁移行为大多发生在同一方言大区中^[13],或者说,劳动力倾向于在方言文化相近的地域范围流动^[14]。然而,这种劳动力流动的“文化倾向型”模式与市场机制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型”流动模式可能并不一致^[10]。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方言相近地域范围流动的原因是什么?更具体的,方言距离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不但有助于深刻理解方言背后的文化对劳动者生活状态的影响,同时对进一步优化劳动力的空间配置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从城市角度来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就是城市包容性问题^[15]。城市包容性源自包容性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涉及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多个维度的均等性和公平性^[15-17]。城市包容性无疑会对流动人口的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从而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与本文较为相关的文献大多数关注了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落户意愿的影响,并且研究结论较为一致。例如,刘金凤和魏后凯的研究表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越强^[18]。李叶妍和王锐的研究表明,城市包容性越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越强^[15]。类似的,吕明阳等发现,城市包容性能够促进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对新生代、跨省流动农民工更明显^[16]。

根据上述文献,城市包容性能够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那么,城市包容性是否能够缓解方言距离代表的文化差异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负面影响?作用机制又是什么?目前来看,并未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在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机制分析方面存在可拓展研究的空间。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并对作用机制展开分析。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研究内容方面,首次在同一框架下研究了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补充了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文献。第二,识别策略方面,立足于因果效应推断评估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和社会融入的因果关系,利用工具变量估计、安慰剂检验等计量方法保证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潜在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既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为更好地推动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提供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方言差异带来的文化多样性造成“人以群分”,而且导致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和不信任,增加正式制度的执行成本^[19]。尽管普通话的推广弱化了方言对正式沟通的阻碍效应,但方言作为个体文化名片,或者说方言作为文化观念的载体,所代表的地域文化烙印和身份认同属性依旧重要^[20]。方言多样性带来的文化差异影响人们交往的心理距离,因此方言多样性越大越有可能产生摩擦或冲突^[8,21],增加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9]。与本文相关的研究表明,劳动者家乡城市和流入城市之间的方言距离越大,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和落户意愿越低^[12]。而城市包容性涵盖了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5]。从本质上来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流动人口在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等方面与流入地居民相互适应的过程。城市包容性蕴含着一个城市的发展理念与文化内涵,城市包容性水平越高,对人才的吸引能力越强,本地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越高^[16-17]。因此,城市包容性可能有助于缓解方言距离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负面影响。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方言距离越大,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越低。而城市包容性促进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

入,同时能够弱化方言距离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负面影响。

社会参与是流动人口与城市沟通的纽带,是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具象化。方言距离带来的文化差异影响人们交往的心理距离,因此方言距离越远越有可能产生摩擦或冲突。张楠等发现,方言差异阻碍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参与志愿者协会等社会活动^[22]。因此,方言距离越远,流动人口越难以参与当地社会生活,从而造成了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的疏离,这显然不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此外,城市包容性会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劳动权益是城市包容性的重要维度,祝仲坤的研究表明,过度劳动会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参与,即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的社会参与存在“挤出效应”^[23]。理论上来看,包容性更高的城市对外来流动人口参与本地社会生活具有更为开放的态度。由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方言距离阻碍了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造成了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的疏离。而城市包容性能够增强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的参与度,同时削弱方言距离对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负面影响。

从本质上讲,城市是一个企业和劳动力高度集中、人与人之间进行密集交流信息的场所。从交流的角度,使用同一种语言能避免与当地人的沟通障碍,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社会互动也会更加频繁,从而身份认同感增强^[24]。社会网络的建立和拓展依赖于人际间的交往和言语沟通,对我国而言,人际交往存在突出的乡土情结,乡音偏向导致使用相同方言的个体互相更具亲近感^[25]。同时,方言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此,方言距离越远,流动人口越难以与本地人形成一种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越难以建立本地社会网络,这是方言距离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机制。而城市包容性更高意味着对待不同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的态度越包容,城市提供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也能增加流动人口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缓解不同文化背景人群交流的心理隔阂。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方言距离带来的文化差异增加了人际间的交流障碍,不利于流动人口和当地人的社会交往,阻碍了流动人口在当地社会网络的建立。而城市包容性有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同时弱化方言距离对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负面影响。

经济层面与流入城市的趋同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前提条件。那么,收入因素是方言距离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作用机制吗?理论上,方言距离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一方面,方言距离会阻碍流动人口的社会交流,考虑到“干中学”或者说学习机制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重要性,方言距离可能不利于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方言距离带来的文化差异意味着多样化的思想和理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劳动者之间存在技能和思想上的互补性,因此跨方言流动可能获取更高的收入回报。从现有实证研究来看,金江等的研究表明,与在同一方言大区内部流动相比,跨方言大区流动的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更高^[26]。类似的,胡雯和张锦华的回归结果也表明,方言距离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7]。城市包容性涉及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多个维度的均等性和公平性,预期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4:收入因素并非方言距离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机制,跨方言迁移会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亦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设计

1. 基准模型设定

为了对假设1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integration_{ic} = \beta_0 + \beta_1 dia_dist_i + \beta_2 inclusive_{ic} + \beta_3 dia_dist_i \times inclusive_{ic} + \gamma X_{ic} + \varepsilon_{ic} \quad (1)$$

其中,下标*i*表示个体,*c*表示城市;*integration*表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dia_dist*表示方言距离,

$inclusive$ 表示城市包容性, $dia_dist_i \times inclusive_c$ 表示两者的交互项。 X_{ic} 为控制变量向量, 其中, 个人层面信息包括受访者的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健康、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民族、流动范围、城市生活年限、户口以及工作特征变量; 家庭层面信息包括家庭人均支出水平、家庭人数、是否有本地暂住证;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人均 GDP、城市规模、城市产业结构。 ε_{ic} 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2. 内生性问题讨论

在本文的研究中, 方言距离的内生性问题值得关注。本文对方言距离的度量基于流动人口家乡县(区)所属的方言片和当前所在县(区)所属方言片信息。跨方言迁移是劳动者的自选择行为, 因此方言距离可能与劳动者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密切相关, 从而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借鉴借鉴鲁永刚和张凯的研究, 本文选择流动人口家乡城市和流入城市年均降水量差距作为方言距离的工具变量^[14]: 一方面, 地理因素和自然环境对文化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降水量差距越大, 农业生产方式越不同, 从而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化距离就越远。因此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定。另一方面, 降水量作为自然因素, 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因此, 降水量差距是方言距离的一个有效工具变量。

(二) 数据描述

本文的微观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 剔除没有工资收入和劳动关系、年龄小于 16 岁或大于 65 岁以及缺失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相关信息的样本, 最终, 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集为涵盖 283 个城市的 62938 个个体。

(三) 变量定义

1. 社会融入

2017 年 CMDS 问卷设计了八个问题反映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情况, 分别为“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地方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 成为其中一员”“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 受访者在完全不同意(赋值为 1)、不同意(赋值为 2)、基本同意(赋值为 3)、完全同意(赋值为 4)中进行选择。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度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的指标, KMO 值为 0.827, 表明样本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 并且只有一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特征值为 2.293), 该因子即表示社会融入。进一步, 根据因子载荷可计算得出本文需要的表征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要指出的是, 由于该因子存在负值, 不便于经济意义的解释, 本文参考夏怡然和陆铭的做法^[28], 将这一因子加上一个值, 调整为最小值为 0 的非负值, 这种调整并不改变社会融入程度的相对差异, 对回归结果也不会造成影响。

2. 方言距离

方言距离数据来源于徐现祥等公布的中国方言数据库^[29]。汉语方言由粗略到细致分为方言大区、方言区和方言片, 其中: 方言大区有 10 个, 即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平话; 方言区有 24 个, 是在方言大区基础上对官话区和闽语区进行细分; 方言片有 105 个, 是汉语方言的最小划分单位。徐现祥等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整理了每个县级行政单位所属的方言片^[29]。这一方言数据库在相关经验研究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9, 22, 30]。从现有研究来看, 不同学者使用这一方言多样性数据, 针对不同经济问题得到的研究结果与经济理论相一致, 这在侧面证明了这一方言数据库的可靠性^[9, 21-22]。

3. 城市包容性

借鉴现有文献对城市包容性的度量^[15-17], 基于 2017 年 CMDS 的问卷设计, 本文从劳动权益、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三个维度度量城市包容性, 相关变量及含义见表 1。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城市包容性指标, KMO 值为 0.634, 表明样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只有一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 1(特征值为 1.224), 将其作为城市包容性指标。同样, 由于存在负值, 进一步将其调整为最小值为 0 的非负值, 这对回归结果不会造成影响。

表1 城市包容性相关变量

维度	变量	变量含义	方向
劳动权益	过度劳动	每周工作小时数是否超过 50 小时,是为 1,否为 0	-
	劳动合同	是否签订固定劳动合同,是为 1,否为 0	+
	工会	是否参加工会,是为 1,否为 0	+
社会保障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为 1,否为 0	+
	居民健康档案	本地是否给受访者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是为 1,否为 0	+
公共服务	健康教育	接受过健康教育的数量,取值 0—9	+
	补贴性住房	是否享有补贴性住房,是为 1,否为 0	+

注:2017年CMDS问卷分别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在现居村(居)是否接受过如下9种健康教育,即职业病防治、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生殖健康与避孕、结核病防治、控制吸烟、心理健康、慢性病防治、妇幼保健和优生优育、突发公共事件自救。本文借鉴祝仲坤的做法^[31],将受访者接受的健康教育项数加总,得到取值为0—9的指标。

表2给出了相关变量的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所有变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变异,这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撑。

表2 主要变量的含义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社会融入	<i>integration</i>	使用因子分析法测度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	4.4	0.883
方言距离	<i>dia_dist</i>	流动人口家乡县(区)和流入县(区)的方言距离	1.636	1.235
城市包容性	<i>inclusive</i>	使用因子分析法测度的城市包容性	1.123	0.739
年龄	<i>age</i>	年龄	34.729	9.45
性别	<i>gender</i>	男性为1,女性为0	0.556	0.497
健康	<i>health</i>	健康情况	3.847	0.389
教育年限	<i>eduyear</i>	受教育年限	10.927	3.409
婚姻	<i>marriage</i>	已婚为1,其他为0	0.763	0.425
政治面貌	<i>party</i>	党员为1,其他为0	0.061	0.239
民族	<i>ethnicity</i>	汉族为1,其他为0	0.928	0.258
流动范围(%)	<i>migttype</i>	流动范围,分为3类	—	—
跨省	—	跨省流动	49.62	—
省内跨市	—	省内跨市流动	33.46	—
市内跨县	—	市内跨县流动	16.92	—
城市生活年限	<i>cityexp</i>	流动人口在本城市生活的年限	6.156	5.484
户口	<i>hukou</i>	非农户口为1,农业户口为0	0.252	0.434
行业	<i>work_indu</i>	工作所处行业,虚拟变量	—	—
单位	<i>work_type</i>	工作单位性质,虚拟变量	—	—
职业	<i>work_occu</i>	职业,虚拟变量	—	—
同住家庭成员数	<i>family_num</i>	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的数量	2.974	1.201
家庭人均支出(对数)	<i>lnexpend_per</i>	家庭人均支出的对数	0.523	0.204
居住证	<i>temp_certi</i>	是否有本地的居住证/居住证,是为1,否为0	0.672	0.470
城市人均GDP(对数)	<i>lncitygdp</i>	所处城市的人均GDP,取对数	11.258	0.452
城市人口规模(对数)	<i>lndensity</i>	所处城市的人口密度	0.105	0.114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例(%)	<i>ratio23</i>	所处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例	94.549	5.145

注:健康变量(共分为4类),即生活不能自理=1,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2,基本健康=3,健康=4;单位变量(共分为12类),即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股份/联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港澳台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社团/民办组织,其他,无单位;行业变量(分为20个行业),即农林牧渔,采矿,制造,电煤水热生产供应,建筑,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住宿餐饮,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体和娱乐,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职业变量(分为8个职业),即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无固定职业,其他。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表3报告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采用的是逐步回归法。列(1)只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即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列(2)加入了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变量;列(3)进一步控制了家庭特征变量;列(4)是完整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控制变量下核心解释变量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鉴于此,以列(4)的估计结果为例进行说明。

表3 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类型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1)	(2)	(3)	(4)	
核心变量	方言距离	-0.130*** (0.005)	-0.087*** (0.006)	-0.090*** (0.006)	-0.086*** (0.006)
	城市包容性	0.095*** (0.008)	0.057*** (0.009)	0.054*** (0.009)	0.058*** (0.009)
	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	0.027*** (0.004)	0.021*** (0.004)	0.020*** (0.004)	0.021*** (0.004)
	年龄		0.008*** (0.003)	0.004 (0.003)	0.003 (0.003)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性别(男性=1)		-0.003 (0.007)	-0.002 (0.007)	-0.002 (0.007)
	健康		0.134*** (0.009)	0.135*** (0.009)	0.135*** (0.009)
	教育年限		0.018*** (0.001)	0.017*** (0.001)	0.017*** (0.001)
个体特征	婚姻(已婚=1)		0.093*** (0.010)	0.058*** (0.011)	0.064*** (0.011)
	政治面貌(党员=1)		0.050*** (0.015)	0.049*** (0.015)	0.046*** (0.015)
	民族(汉族=1)		-0.012 (0.014)	-0.012 (0.014)	-0.007 (0.014)
	省内跨市		0.052*** (0.009)	0.056*** (0.009)	0.051*** (0.009)
	市内跨县		0.099*** (0.012)	0.115*** (0.012)	0.092*** (0.013)
	城市生活年限		0.016*** (0.001)	0.014*** (0.001)	0.015*** (0.001)
	户口(非农户口=1)		0.097*** (0.009)	0.096*** (0.009)	0.094*** (0.009)
	行业、单位、职业		是	是	是
	同住家庭成员数			0.029*** (0.004)	0.028*** (0.004)
	家庭特征	人均消费支出(对数)			0.035*** (0.007)
居住证				0.037*** (0.007)	0.041*** (0.007)
城市人均GDP(对数)					-0.054*** (0.013)
城市特征	城市人口规模(对数)				0.011*** (0.005)
	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之和(%)				-0.002** (0.001)
	常数项	4.455*** (0.010)	3.304*** (0.064)	3.024*** (0.079)	3.754*** (0.124)
	样本量	62938	62938	62938	62938
	调整R ²	0.031	0.072	0.073	0.07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方言距离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表明方言距离阻碍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城市包容性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城市包容性有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方言距离和城市包容性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城市包容性缓解了方言距离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负面影响,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

其他变量系数估计值的方向基本和预期相符。个体特征方面,健康水平和教育年限是反映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人力资本有助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经济融合状况,从而有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年龄及其平方项的系数估计值并不显著^①,说明年龄并不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已婚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更高,相比于未婚流动人口,已婚流动人口融入流动城市的需求更为强烈。民族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并不显著,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国已坚持多年的民族平等和鼓励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使得不同民族的社会融入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在样本中少数民族的比例仅为7.1%,从而导致估计效果不明显。政治面貌为党员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更高,可能的原因是党员的价值观更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现代性,同时接触的人和事的视野更为开阔。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越远,社会融入水平越低,原因在于远离家乡带来的心理成本更大。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年限的增加,流动人口会在工作和生活中逐步适应城市生活节奏,因此会提高社会融入水平。非农户口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要高于“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特征方面,同住家庭人数越多的流动人口,其社会融入水平越高。家庭成员的陪伴可以缓解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压力。家庭特征方面,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反映了家庭的福利水平,和社会融入呈明显的正相关。办理本城市居住证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要高于未办理暂住证的流动人口,这和经济直觉也是相符的。城市特征方面,城市人均GDP、城市产业结构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而言城市发展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工作、生活压力越大,因此社会融入水平较低。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越高。这与黄梦琪和金钟范的研究发现类似,他们发现城市规模的扩大会通过增加个体稳定就业概率和同乡集聚效应提高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32]。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基本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替换因变量、安慰剂检验、子指标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

借鉴鲁永刚和张凯的研究,选择流动人口家乡城市 and 所在城市年均降水量差距作为方言距离的工具变量^[14],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结果见表4。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与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对比可以看出,本文关心的3个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的方向保持不变,而且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从数值对比来看,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结果和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变化幅度并不大,这说明基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从工具变量法的检验结果来看,识别不足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保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4 工具变量和改变社会融入度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法	替换因变量	
	流动人口的 社会融入	落户意愿	定居意愿
方言距离	-0.148*** (0.019)	-0.025*** (0.015)	-0.185*** (0.017)
城市包容性	0.092*** (0.006)	0.189*** (0.016)	0.318*** (0.024)
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	0.024*** (0.004)	0.102*** (0.010)	0.090*** (0.0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62938	62938	62938
调整 R ² /pseudo R ²	0.071	0.086	0.155
工具变量检验			
识别不足检验	2368.8 [0.0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2459.2 {16.38}		

注:识别不足检验使用的是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检验的原假设是工具变量识别不足,中括号内数值为 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统计量的 P 值,检验结果为拒绝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使用的是 Kleibergen-Paap rk F 统计量,原假设是弱工具变量,方括号内为 Stock 和 Yogo 提供的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检验结果为拒绝原假设^[33]。

①尽管表3列(2)和列(3)中年龄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但从数值大小来看,并不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

2. 替换因变量: 改变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度量指标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是未来城市人口动态变化的前瞻性指标, 在现有文献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思路^[3, 11-12], 基于 2017 年 CMDS 数据的问卷设计, 构建两个反映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指标: 其一, 落户意愿。如果流动人口愿意将户口迁入本地, 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①。其二, 定居意愿。如果流动人口愿意在本地定居, 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②。由于这两个因变量是虚拟变量, 因此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 估计结果见表 4 最后两列。方言距离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和定居意愿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而城市包容性在提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和定居意愿的同时弱化了方言距离的负面影响。因此, 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1。

3. 安慰剂检验: 方言距离的随机分配

为检查基准估计结果是否受其他遗漏变量的影响, 本文采取为流动人口的方言距离随机赋值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 随机为每一个流动人口的方言距离赋值为 0 到 3 的某个值, 进而进行回归分析,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 3 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将这一过程重复 200 次, 然后绘制每个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分布密度图, 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 方言距离、方言距离与城市包容性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高度集中在 0 附近并且近似于正态分布, 而城市包容性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显著异于 0。因此, 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这进一步保证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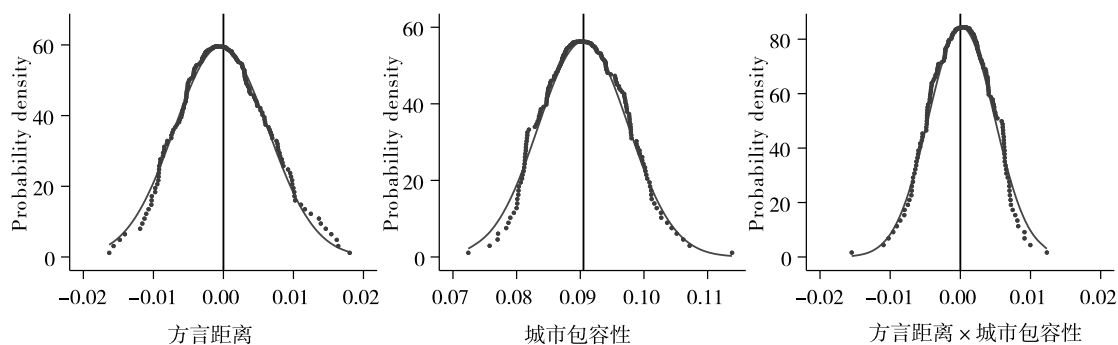


图 1 安慰剂检验

4. 子指标回归

在上文的研究中, 使用因子方法将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 8 个指标转化为一个综合性指标, 将其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进一步保证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分别将 8 个子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同时, 分项回归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对不同维度社会融入的影响。还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社会融入的子指标都是有序变量, 理论上使用有序选择模型和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更为合适, 但有序选择模型对交互项系数的解释较为复杂。同时, 线性模型的 OLS 估计结果与有序选择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在方向和显著性方面都具有 consistency。因此, 本文选择常规的线性模型, 估计结果表明 8 个因变量的估计结果均和基准模型一致。篇幅限制的原因, 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①具体的问题是“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 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 受访者在“愿意”“不愿意”“没想好”中进行选择。如果受访者回答“愿意”, 赋值为 1, 如果受访者回答“不愿意”或“没想好”, 赋值为 0。为保证稳健性, 本文还进一步删掉了回答“没想好”的样本, 发现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②基于两个问题构建定居意愿指标。第一个问题是“今后一段时间, 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 受访者在“是”“否”“没想好”中进行选择; 如果受访者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 进一步询问第二个问题“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 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 受访者在“1—2 年”“3—5 年”“6—10 年”“10 年以上”“定居”“没想好”中进行选择。借鉴刘金凤和魏后凯对定居意愿指标的构建方式^[12], 若受访者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并且第二个问题回答“定居”, 赋值为 1, 其他情况赋值为 0。为保证稳健性, 本文还进一步删掉了回答“没想好”的样本, 发现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五、机制分析

(一) 社会交往

为对本文的假设2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根据2017年CMDS的问卷设计,定义一个取值为0或1的社会交往指标^①。表5报告了机制分析结果,列(1)是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Logit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方言距离的估计值为负,即方言距离越大,流动人口与当地人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越低。而城市包容性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即推动了流动人口与当地人进行社会交往。方言距离和城市包容性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即城市包容性缓解了方言距离对社会交往的负面影响。而根据列(3)的估计结果,社会交往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即社会交往有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综上,支持了假设2。

(二) 社会参与

为对假设3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根据CMDS问卷设计,定义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指标。将其作为因变量,构建Logit模型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见表5列(2)。可以看出,方言距离阻碍了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而城市包容性促进了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同时弱化了方言距离对社会参与的负面影响。而根据列(3)的估计结果,社会参与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社会参与有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综上,支持了假设3。

(三) 进一步讨论: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

为对假设4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将因变量替换为流动人口的小时工资收入(对数),考虑到不同城市生活成本存在差异,而最低工资能反映城市的基本生活费用和物价水平,为此,进一步将2017年城市最低工资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实际工资调整。根据表6,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方言距离和城市包容性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收入并非方言距离降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的作用机制。结合前文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一方面,工资反映了劳动生产率,跨方言流动会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跨方言流动却不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一个重要推论是,方言距离会阻碍劳动力要素追求边际收益最大化的流动和配置^[10]。而城市包容性在提高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缓解方言距离负面影响的同时,还能发挥提升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作用。

六、结论性评述

基于2017年CMDS数据,本文考察了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及其交互项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

表5 作用机制检验

	(1)	(2)	(3)
	社会交往	社会参与	流动人口的 社会融入
方言距离	-0.311 *** (0.018)	-0.037 *** (0.147)	-0.077 *** (0.006)
城市包容性	0.180 *** (0.023)	0.357 *** (0.022)	0.035 *** (0.009)
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	0.051 *** (0.011)	0.025 *** (0.010)	0.020 *** (0.004)
社会交往			0.161 *** (0.008)
社会参与			0.189 *** (0.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62938	62938	62938
调整R ² /pseudo R ²	0.118	0.077	0.090

表6 方言距离和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

	名义工资	实际工资
方言距离	0.015 *** (0.003)	0.015 *** (0.007)
城市包容性	0.178 *** (0.005)	0.182 *** (0.009)
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	0.005 *** (0.002)	0.003 * (0.002)
生活成本(2017年城市最低工资)		0.208 *** (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62307	62307
调整R ²	0.414	0.415

^①具体的问题是“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及其他亲属)”,如果受访者选择“本地人”,赋值为1,若受访者选择“同乡”“外地人”“很少与人来往”,赋值为0。

响效应,并对潜在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第一,方言距离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而城市包容性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同时能够缓解方言距离的负面影响。在采用工具变量法、替换因变量、安慰剂检验以及子指标回归后,该结论依旧稳健。第二,机制分析发现,方言距离阻碍了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这是方言距离阻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机制,而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都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能够缓解方言距离的负向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因素并非方言距离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作用机制,事实上,跨方言流动反而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这意味着方言差异会阻碍劳动力要素追求边际收益最大化的流动和配置。

本文对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优化劳动力空间配置,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加大对普通话的推广力度,降低居民交流和沟通的障碍,削弱方言背后的地域文化烙印和身份认同属性。其次,以围绕提升城市包容性为重点,建立城市流动人口政策体系,特别是要加大对流动人口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的重视,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让流动人口更好地参与城市生活。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建立要素能够充分自由流动的一体化国内市场,增强区域间文化沟通和交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对于构建一体化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现有文献形成了良好的边际补充,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第一,理想的数据集是能够追踪流动人口的面板数据集,从而能够动态性地考察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但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仅使用了2017年的CMDS数据。未来可能会有更适合的微观数据集,计量模型也会进一步发展,可以对这一局限予以改善。第二,机制分析方面可能不够全面。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还可能存在其他的作用机制,这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考察。

参考文献:

- [1]陈昊,赵春明,杨立强.户籍所在地“反向歧视之谜”:基于收入补偿的一个解释[J].世界经济,2017(5):173-192.
- [2]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2(5):141-160.
- [3]王忠,旷远瑶.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J].劳动经济研究,2019(4):102-120.
- [4]陆铭.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J].经济学(季刊),2017(4):1499-1532.
- [5]Guiso L, Paiella M. Risk aversion, wealth, and background risk[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8, 6(6): 1109-1150.
- [6]Whorf B L.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M]. Cambridge: MIT Press, 1956.
- [7]Boroditsky L. Does language shape thought? Mandarin and English speakers' conceptions of time[J]. Cognitive Psychology, 2001, 43(1): 1-22.
- [8]Feng W, Wu Y, Fu Y. Dialect divers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21, 29(2): 49-72.
- [9]李光勤,曹建华,邵帅.语言多样性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地区差异[J].世界经济,2017(3):144-168.
- [10]张新星,汪丽萍.文化分割、要素错配与区域经济增长[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0(5):93-102.
- [11]卢盛峰,陈悦.语言的力量:讲本地话增进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吗?[J].经济科学,2019(4):118-128.
- [12]刘金凤,魏后凯.方言距离如何影响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社会融入的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22(1):34-52.
- [13]刘毓芸,徐现祥,肖泽凯.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J].经济研究,2015(10):134-146.
- [14]鲁永刚,张凯.地理距离、方言文化与劳动力空间流动[J].统计研究,2019(3):88-99.
- [15]李叶妍,王锐.中国城市包容度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1):146-154.
- [16]吕明阳,张益,王小明.城市包容性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J].城市发展研究,2022(3):105-115.
- [17]周颖刚,蒙莉娜,林雪萍.城市包容性与劳动力的创业选择——基于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J].财贸经济,2020(1):129-144.
- [18]刘金凤,魏后凯.城市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J].经济管理,2019(11):20-37.
- [19]高翔,龙小宁.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会影响区域经济吗?[J].经济学(季刊),2016(2):648-674.

- [20] 林建浩, 赵子乐. 均衡发展的隐形壁垒: 方言、制度与技术扩散[J]. 经济研究, 2017(9): 182 - 197.
- [21] 程博, 潘飞. 语言多样性、信息获取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J]. 管理科学学报, 2017(4): 50 - 70.
- [22] 张楠, 高梦媛, 寇璇. 卫生公平的文化壁垒——跨方言区流动降低了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吗? [J]. 财贸经济, 2021(2): 36 - 50.
- [23] 祝仲坤. 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挤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5): 108 - 130.
- [24] Korinek K, Entwisle B, Jampaklay A. Through thick and thin: Layers of social ties and urban settlement among Thai migrant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5, 70(5): 779 - 800.
- [25] 蒋为, 周荃, 向姝婷, 等. 方言多样性、团队合作与中国企业出口[J]. 世界经济, 2021(4): 103 - 127.
- [26] 金江, 孟勇, 张莉. 跨方言区流动、自选择与劳动力收入[J]. 统计研究, 2018(8): 94 - 103.
- [27] 胡雯, 张锦华. 密度、距离与农民工工资: 溢价还是折价? [J]. 经济研究, 2021(3): 167 - 185.
- [28] 夏怡然, 陆铭. 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10): 78 - 90.
- [29] 徐现祥, 刘毓芸, 肖泽凯. 方言与经济增长[J]. 经济学报, 2015(2): 1 - 32.
- [30] 丁从明, 吉振霖, 雷雨, 等. 方言多样性与市场一体化: 基于城市圈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18(11): 148 - 164.
- [31] 祝仲坤. 公共卫生服务如何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10): 125 - 144.
- [32] 黄梦琪, 金钟范. 城市规模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经验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7): 17 - 29.
- [33] Stock J H, Yogo M.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 in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 for econometric model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责任编辑: 高 婷]

Dialect Distance, Urban Inclusivenes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ZHU Shihui, SU Zhangjie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2017 National Population Dynamics Monitoring Surve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alect distance, urban inclusiveness,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under the same framework. The study found that dialect distance hinder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while urban inclusiveness can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an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dialect distance.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dialect distance hinders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migrants, while urban inclusiveness weaken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dialect distance while promoting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come is not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dialect distance, and cross-dialect mobility instead increases the income of the migrants, which means that dialect distance hinders the flow and allocation of labor factors to maximize the marginal benefit.

Key Words: dialect distance; urban inclusiveness; social integration; spatial migr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 social interac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